

在阿Q诞生地讲阿Q

■张梦阳

北京西直门内的八道湾十一号，是“周氏三兄弟”的故居。鲁迅曾在这里写了《阿Q正传》等重要作品，是中国鲁迅学界的重地。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先生为此专门写了《八道湾十一号》一书，颇受欢迎。

所以当时一听说这片房屋要拆迁，鲁研界就强烈反对，认为应该保护这一历史遗址。但是到底还是拆了。不过政府采取了两全其美的方案：本在西单北京名校三十五中迁到八道湾，“周氏兄弟旧居”整修一新，就在校园里。鲁迅长孙周令飞的鲁迅文化基金会设在故居入门的房间。这样，既保护了故居，又使三十五中的学生一入学就受到鲁迅文化氛围的熏陶。学校成立了鲁迅立人教育研究会，吸收热爱鲁迅的师生参加。鲁迅研究新秀荣挺进先生专门开辟了鲁迅系列专题课，请国内外鲁迅研究专家到校讲学，三十五中成了北京中学学习、研究鲁迅的中心。

四月二十日下午，我有幸被请到这块阿Q的诞生地讲阿Q，讲阿Q是怎样的文学典型？我们从中汲取什么教益？

1921年12月《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登到第四章时就引起读者的批评，认为“讽刺过分”，“算不得完善了。”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即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明确指出：《阿Q正传》不是讽刺小说，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使他联想起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摩夫。

深知鲁迅创作内情的周作人，也以仲密的名义在《晨报副刊·自己的园地》专栏中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指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

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是鲁迅“提炼粹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文末披露了阿Q的生活原型——绍兴家乡“一个缩小的可爱的阿贵”。鲁迅自己也明确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会比以后由于种种压抑而被扭曲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以上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近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

但是，随着狭隘阶级论日占上风，这些真义却遭到不断的批判。《阿Q正传》是写阶级斗争的书，阿Q是农民甚至破落地主的典型等等怪论甚嚣尘上。1951年与鲁迅有过亲密接触的冯雪峰指出：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这一“寄植说”是符合鲁迅、茅盾、周作人最初意见的，迎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批判，认为冯雪峰是对阶级论的否定，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势头凶猛，冯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提法。

但是阿Q典型性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被称为鲁研界和文学理论界的“歌德巴赫猜想”，虽遭挫折，却吸引起学者们浓厚的理论兴趣。1956年，何其芳发表了《论阿Q》，提出了“共名说”——某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堂·吉珂德成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共名”，阿Q则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共名”。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对何其芳的批判如成群的马蜂扑来，蜇得他浑身伤痛。但他始

终不服气，“文革”中我向他求教时，他几次愤怒地说：“我怎么跌入‘人性论’的泥坑了？我是永远不接受的。”表示以后如果有写文章的权利，还要论辩这个问题。这也激发我立志研究阿Q的典型性课题。倘说我“陪了鲁迅一辈子”，其核心就是陪阿Q研究。

陈涌同志曾写过《阿Q与文学的典型问题》和《〈阿Q正传〉引起的争论》。第一篇是我凭着与他的私交“软磨硬泡”拿到《鲁迅研究》第3辑发表，第二篇是陈涌自己在巴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报告会上宣读的。陈涌是何其芳一手培养起来的鲁迅研究家，他实际上进一步阐释了何的“共名说”，加强了哲学深度，并拓展到世界文学的视野。

上世纪80年代编纂《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时，我就着重收集阿Q研究的资料，只言片语也没有放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反复细读，潜心揣摩。90年代初《汇编》完成后，就在冯雪峰、何其芳、陈涌的基础上全力投入阿Q典型性研究。1991年9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供了长篇论文《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随后扩展为27万字的专著《阿Q新论》（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再经过二十余年的思考，我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阿Q正传》实质是一位思想家的文学家创作的哲学小说。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珂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弱点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以这些典型人物为镜子，人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给世界文学典型画廊的惟一一个出色的典型形象。《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第一部传播到世界、受到罗曼·罗兰等大作家称赞的现代文学作品。如陈涌所说：“鲁迅即使没有其

他，只要有一部《阿Q正传》，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至今，《阿Q正传》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阿Q和他的精神胜利法在中国还很普遍！确实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令国人惊醒、深省！

之所以提出“思想家的文学家”这一说法，是因为单纯的思想家，可能写出关于“精神胜利法”的哲学论著，但写不出小说《阿Q正传》；单纯的文学家，即使能够写出阿Q的故事，又写不出其中的哲学性。只有鲁迅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加“诗人”的具有“精神诗性”的思想家兼文学家才能写出《阿Q正传》。

至于《阿Q正传》的哲学性，最近看到作家毕飞宇解读《阿Q正传》的文章，非常欣赏！他说《阿Q正传》是一部“御侮的方法论”的小说，阿Q无论受侮时还是中兴后欺侮别人时，都是奴才，正点出了这部小说的哲学性。

但我觉得仅点出方法论尚不够，还须深入到认识论。方法源自认识，精神胜利法产生于对自己和世界的错误认识。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鲁迅青年时代就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临终前不久又提醒“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应有自知之明与自知人之明。其实就是说要认识自己 and 认识世界，在二者的比较中确定自己应对外界的方略，从“本能的”人“升华到”“自觉的人”。堂·吉珂德当骑士大战风车，四处碰壁，重病归家，临死前明白“自己只是普通人，并不是什么骑士”。阿Q被捆绑刑场枪毙，仍然昏聩、颓顶，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死！这就是至死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

所以，做个明白人，不要像阿Q那样糊涂地生活。当是我们从中汲取的重要教益。

■

阎纲，文心不老

■陈世旭

2016年将近年关，忽然收到著名评论家阎纲文集三卷四册，洋洋数百万言。上世纪八十年代，阎纲对我多所鼓励。将近三十年，因写作成绩不佳，羞于面对先生，未敢音问。而今先生不在了，我的感动莫可名状。当年的往事到那一涌而出。

四十年前，我在一个遥远的南方乡镇，就职于县文化站，刚成家，主要出于补贴家用的目的，一有空就琢磨写小说，因为从小就只有这么点对文学的爱好。记不清多少次退稿，忽然有一篇在北京的《十月》杂志发表。兴奋之余并没有更多的期待，一百多元的稿费，是我月工资的三倍，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知足得不得了。有一天忽然听同事说，有几张报纸的文章提到你的小说了。我惴惴不安，赶紧去找那些文章，还好，都是说好话的。其中一篇标题《习惯的写法打破了》，一声喝彩，一腔古道热肠，扑面而来。我盯着署名发了一阵呆，记住了“阎纲”这个名字。

最早见到先生本人，是在大约半年后。我被《十月》杂志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进修，有一天被通知参加《文艺报》的一个座谈会，正老实地坐着，身后有人轻轻拍我。我随他到会议室外的走廊上，他说，我是阎纲。他高高瘦瘦，跟我说话得弯着腰，我看着他仰着头。

头次见面，没有闲话。先生当时一脸忧色，说到反映，你是文讲所里最狂的人。我棍子一样戳在那里，一下懵了。那期文讲所学员，大都是我之前像星星一样仰望的人，我下决心学写小说的那些日子，为了走捷径、抄近道，主要读的是他们一部接一部轰动小说，没想到有一天来到他们中间了，很是紧张，像是在宾馆里进错了门。

这之前，来不来文讲所我一直迟疑不决。《人民文学》请了几个人来京写小说，住了将近一个月，冯骥才、贾大山他们都顺利交了稿，我一个字也没憋出来。《十月》发的那篇是在好几篇退稿上改出来的，再写点什么，我脑子里一点眉目也没有。不久后参加一个小说座谈会，大评论家冯牧谈到我的时候说，听说他发了处女作后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同样的话几天后又听到一次。是《十月》为改稿的作者安排的防空洞招待所，我和当时在宁夏的作家戈文觉同住，一天晚上他跟他人通长途，相互称赞了一番之后，听说跟他在一块的人是我，对方说：他好像就那回事，什么也写不出了。电话完了，戈文觉笑着说：刚是公刘的电话，他夸你呢。差不多半夜，在地洞里，老式的座机，那边说什么我听得一清二楚。公刘是我从小崇拜的诗人，他的话，我听来，不亚于死刑宣判。

那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一看见纸笔，脑子里就一团浆糊。周围尽是才子才女，发表作品此起彼伏，像过年放鞭炮。班上的老大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名震天下，《开拓者》如同核爆；同住一屋的古华，刚完成《爬满青藤的木屋》，接着又是《芙蓉镇》。我整天怯生生的，不声不响，说不出的自卑，没事就一个人呆着。有一次在外面集体活动回来，在车上碰巧坐在贾大山旁边，他问我为什么老闷着呀，本以为你少年得志该挺挺狂的呢。我心里苦着，不知怎么回答。一个小乡镇的文青磕磕巴巴好不容易弄出了一点响动，就可以“少年得志”了吗？

阎纲说的那个“狂人”，我怎么也没法跟自己联系起来。即便是讹传，即便是诬告，也不可能落到我这样的人头上——八竿子打不着边啊。我没有打听那说法的来处，也没有解释，觉得没有必要。我早已心生悔意，写得了写，写不了走人，能撑几天还说不定呢。

文讲所学习结束，我拖家带口如愿回了省城，被安排在一个文化单位“专职写作”。回想接下来那些写不出硬写的煎熬的日日夜夜，我至今脊背发凉。我甚至决定改行。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有些什么看法，但我看到报上有些好心的朋友很是为我着急。我事后知道，省里的评论家吴松亭特地去了一趟北京，请他专门就我的几个勉强发出的近作说说好话。他们曾经在《文艺报》共过事。

真是难为阎纲了。不得不评说一些不值一评的文字，还必须正面鼓励，那是怎样的苦心孤诣啊。

那时候，阎纲已经一清二楚地看到了我的特别的没文化。1981年夏，他来江西庐山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我去看他。在白鹿洞书院的碑林，我把“拓片”读作“tuò片”，阎纲把我拉到一边，轻轻说，那个字唸“tà”。我这类人的错，举不胜举，在江苏，张嘴就把“角直”读成了“角直”。所有这些，阎纲在文章里都没有提，只是说，其成长可以期待云云。

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是羞愧还是沮丧。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其实是别无选择的。不久后，路过北京，我特地去看望了阎纲，他再三说，冯牧、公刘都是特别爱惜青年的，他们是为你好。你要振作，要对自己有信心。那天晚上，我在他西郊的家坐到半夜以后。终于不得不告别，他送我到公交站，一直等到间隔好久的夜班车到站，看着我上了车。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面谈。之后，除了在某次作代会拥挤的人群中打过一个照面，我就只是在报章上看到他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的文字。印象最深的是《文学四年》，其高屋建瓴的视野，诗意的文采，读来深获教益。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我的一部刚出的长篇开研讨会，他们开列的邀请名单里有阎纲。但阎纲没有到会。我并没有太大的遗憾。那部小说并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谓研讨会，不过是发为行造势罢了。以先生的眼光，即使接到通知不来也正常不过。前几天偶然说起旧事，我才知道，他那时远在终南山。

四十年，尽管我一直咬牙切齿坚持写着，但一直未见长进，逐渐走向边缘化，终至消失在读者视野之外，被许多先期熟识的同行淡忘。有一年在京开会，一家刊物请饭，让我去一位中国作协副主席的房间里，等着他们来车。那位作家当副主席之前我曾与他一同参加过文学活动，以为他有印象。但那次他对我的特别的客气让我纳闷，出了门我才知道，他以为我是出版社派来接他的司机；曾经在李国文家聆听几位文坛大咖高谈阔论，尤为座中一位大咖的慷慨激昂所动，事后还收到过他的信。多年后，也是一次会议，我在电梯里见到他，惊喜中忘记了他的声名已如日中天，远非当初，像见到家人一样亲热地喊他。不料他惊疑地盯了我好大一会，转脸问身边的人：他是谁？那些人也一个不认识我，都很礼貌地静静看着一个傻子的自讨没趣。我满脸的堆笑霎时凝固。幸好电梯很快到了我住的楼层，我一闪身溜出。

我不太通人情，常常没心没肺。但一个人被自以为是老相识的人彻底忘记，怎么说也是件难堪的事。我忽然明白，一个在专业上出过气的人最大的明白就是要懂得收敛。为了让自己的长记忆，我特地写了一则短文公开发表，题目是《套近乎》，讲套近乎、尤其是跟卓有成效的名人套近乎千万要有自知之明。

没有想到几十年没有联系的阎纲还记得我，寄来了他的文集。

像陈忠实说的“砖头”一样的厚厚的几大本，扎扎实实的鸿篇巨制。文学，文坛，乡音，乡俗，亲情，友情，枝繁叶茂，波翻浪涌。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又何尝不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史。读之感慨万千，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不通古典音韵，又不想削足适履、因字害意，匆忙中写下一些仿古的句子：

书生仗剑出礼泉，
叱咤文坛六十年。
识见有胆勇赤子，
评论无韵成诗篇。
江南梦回竟深夜，
京西别罢已晓天。
世间自来仁者寿，
身后谁人执长鞭？

发送给阎纲后，收到他的回复：很高兴。你是不太说人好话的。

我人微言轻，根本没有月旦人物的资格，好话坏话说了都是白说。阎纲的回复，表现的是一个长者的谦虚。

阎纲的人与文，真，直，硬，浓。真而不失睿智；直而不失风雅；硬而不失柔和；浓而不失明晰。秦人大腔，书生意气，于豪迈中见深情，于奔放中见摇曳，行文节奏明快而收放令人猝不及防，长句戛然而止，短句若击鼓，读之时而愕然，时而惊叹，终于于酣畅淋漓。

皆是性情文字。不久前，我加了他的微信。四十年后，我又在微信上见到阎纲。每天重读他在《微阅读读书会·名家专栏》上连载的散文杂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悲哀，或深思，或坐卧不宁，或啼笑皆非，其中的血气、生气、锐气，让人很难相信是出于一个曾经罹患绝症而已近米寿的生命。

季羡林老人生前在他学术论著自选集的序中写道：“高山、大川、深洞、棧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能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

同样历经沧桑的阎纲的身后，显然也有这样一种鞭策的力量。他的写作活力，他的文心不老，让我汗颜。与他相比，他正年青，而我已垂老。因为生性的懦弱，我的写作不会像他那样长久地坚韧持续，但我会永远记住他在我写作最困窘的时候给予我的切切实实的鼓励。

终结得陇望蜀的玩笑

■任美康

走上台来，我很激动，因为得了二等奖。同时又很紧张，因为此前，从未得过二等奖（更没得过一等奖）。今年狗年，太激动或者太紧张，都容易狗急跳墙，都容易急不择言。故尔，我要尽力地稳住神儿，认真说话，不伤大雅，以不辜负今天颁奖的盛况。

回想这些年，五花八门的文学奖，遍地开花。绝大多数，一锤子买卖，虎头蛇尾，甚而猫头鼠尾。如系民间操办，会有种种不测，倒也情有可原。但不少公家的奖项，划拨了大笔钱，成立了基金会，敲锣打鼓，对付一届，至多两届，撑撑三届，便无疾而终。奖没了，基金会关门了，奖金也没了，则成为流寇，躲到鬼都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而今天的这个奖，声名远播，一口气连办六届，一家民营建筑设计院，每届掏出来的，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这表明：一，老板生意好，如果入不

敷出，企业难以为继，哪还有余钱援手文学；二，老板学问好，除了精通房屋设计，还深谙人世间的文化成果，是建筑的基石，更是建筑的灵魂；三，老板人品好，其坚韧办奖的耐性，堪称百折不挠、一言九鼎的楷模。相形之下，穷得只剩下钞票的土豪何其多也，出尔反尔，说过就忘，扭头赖账的家伙，比比皆是。

自去年金秋时节，华夏大地迈入崭新时代。维系社会前行的各个层面，都在整肃、重建之中。我虽人微言轻，但也萌生一念，各类短矩愈加细化的眼下，似乎还欠缺专事监管奖励的机制。所谓奖励的监督，就是清理那些沽名钓誉的奖，敲打那些劳民伤财的奖，取缔那些藏污纳垢的奖。相应地，对纯付出、纯公益的善举，则予以扶持、予以弘扬。当“公正、有序、健康”之类广告语，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各种奖项方能货真价实地效劳文学。

几年前，在浙江嵊州第三届颁奖会上，作为捧场者发言，

我曾坦承自己，大半辈子与散文、诗歌缘分甚少的尴尬。时隔数年，具有悲悯情怀的评委们，尚能记住并同情我的人生无奈。在本届评选中，为疗治老迈之徒容易滋生的生存沮丧，对我一篇不成器的短文，赏赐二等奖重奖。你们的仁慈，完全等同于救死扶伤啊。

我是一个知好歹的人，一个懂感恩的人。但同时，说得低俗些，也是一个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人；说的高尚些，又是一个总惦记着追求更大光荣的人。就在此刻，捧着二等奖的证书，我竟然穿越时空，瞧见了下届一等奖的曙光。因此，期待各位亲爱的评委，继续帮忙，开启你们捕捉天才的慧眼，在一个民办奖项超凡脱俗的评奖史上，创造奇迹，推向我这位大器晚成的文坛巨匠。

前天开始，出席颁奖活动的朋友，从国内国外来到上海。一副副陌生的面孔，却都像久别重逢。这让我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反复倡导，一个团体，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一个地区，

应创造出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我们这个临时的集体，相逢不过三五日，但认真实践了毛主席的教导。凝聚之力与友爱之心，既已播下春天的种子，一定会长出相互间一年四季的牵挂。

就个人而言，这两天，结识了知我懂我的弟弟妹妹、侄男侄女，时时涌起心弦颤动的快乐。知音面前，应当及时终结玩笑，并诚恳地禀报各位。其实，我是一个厌恶得陇望蜀的人，是一个见好就收的人，是一个向往宽阔格局的人。在初次登临的崇明岛上，有众多高朋作证，暖风洗面的今天，便是本人金盆洗手的日子。混迹于青春人群，来瓜分有限的蛋糕，纯属无聊之举。从今往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远离本奖的角逐，杜绝重演此番低级可笑。

（此文系作者2018年4月10日于上海崇明岛某文学奖颁奖会上的发言）

《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首版30周年纪念征文启事

30年，树的年轮增长了30圈；30年，很多我们曾经的习以为常成为如今的“古典”，30年，在现代社会足以沧海桑田。30年，却有一本语言学习教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习者，它不变的柠檬黄，让我们相信，这世间还有“永远”。

它就是《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

从1998年，到2018年，《标日》成为一些人学习日语的原点，也成为他们人生的原点。

这本定位帮助零起点学习者完全自学日语的教材，30年间，陪伴一批又一批的日语爱好者，循序渐进地掌握自然优美的标

准日语。

从最初目标在出国、职称评定、考研进修的想要改变自己人生的成年人，到如今为了看懂动漫、日剧、原作的追求个性人生的儿童和少年，《标日》被每一个热爱日语的人所选择，它也让选择它的人圆梦。

从电视讲座播出时的万人空巷，到几盒磁带默默陪伴的自学，再到如今的电子激活码、“标日电子叔”的即时相伴，《标日》陪着两代、三代的日语学习者，书写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

关于《标日》，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我们静听属于你的那一个。

2018年，在《标日》首版30周年之际，我

们面向所有《标日》的使用者有奖征稿：十年前曾参与《标日》首版20周年征文的读者，也欢迎你们继续来稿，续写你与标日的故事。根据征文情况，我们将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颁发不低于2000元/人、不低于500元/人的物质奖励和获奖证书，同时将在《中华读书报》、人教社微信矩阵平台开辟专栏定期刊出优秀文章。

文体不限，字数在5000字以下；投稿时间：2018年5月9日—6月30日；

投稿邮箱：zhoud@pep.com.cn；纸质稿投稿邮箱：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7号院1号楼人民教育出版社20层媒体宣传部，邮编100081；